

文明對話與21世紀的儒家

杜維明

提 要：當前國際社會存在各種衝突，如性別、年齡、種族、國家、宗教等等，這些衝突必須通過文明對話以達到可能的和諧，而不是通過政治約定或其他精神因素的調節，更不能通過戰爭加以解決。文明對話的基礎應該是儒家所代表的核心價值觀。有效的文明對話必須建立在相互容忍的基礎上，相互承認、相互尊重是文明對話的前提，這些都是儒家文明的成果。儒家文化強調聆聽，強調心學，這些都會對當代文明對話起到正面的作用。五四時代以及其他時代偏激地否定儒家傳統，不僅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而且在思想邏輯上也犯了以傳統文化的精粹與西方價值理念作片面比較的錯誤。

關鍵詞：儒家；21世紀；文明對話；文明衝突

文化中國與21世紀儒家是一個既顯得寬泛卻又很重要的課題。這一課題仍可以從澳門切入和展開。澳門自中西交流以來，就是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宗教傳入中國的橋樑，利瑪竇等耶穌會的教士以澳門為基地，逐漸融入中國知識界；中國知識界以澳門為窗口認識西方，英文報紙、女子中學等等都首先出現在澳門。澳門，文化底蘊深厚，民間文化的傳承活躍，同時具有強大的包容性，是多種語言、多種信仰和族群融合的典範，在促進中國與金磚四國（BRICs）在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關鍵角色。澳門文化是文化中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又是極富特色的部分，這種特色對於理解文明對話的當代性和世界性意義，對於考量21世紀儒家文化，具有某種思想資源意義和實踐價值。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同質化的過程，地球越來越小，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越來越頻繁，逐步實現着“天涯若比鄰”。而文化的全球化，彼得·伯格指出是一種多元化的景象。全球化不僅是西方化、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因為西方化是一個地域性名詞，現代化是一個時間性名詞，但是全球化，包括地域、時間，所以全球化是一個複雜的體系，不可用單線的方式、因果的方式去瞭解它。全球化作為一種多元景象，將使得每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非常關注塑造他們原初聯繫的基本條件，這些基本條件包括族群、性別、語言、年齡、地域、階層、宗教。

首先關於族群。假如族群的問題處理得不好，社會將面臨解構的危機。例如很多學者認為，在美國，如果黑白種族問題處理不當，美國將會分裂；同樣在中國，如果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關係處理不當，結果同樣危險，有學者指出中國是一元多體，一元要維持它的和諧、發展，就必須與多體保持必然的互動。其實要實現這樣的格局，文明對話的環節必不可少。

其次，關於性別，男女平等是一大不可忽略的問題。過去五十年，女性主義運動成為世界一大潮流，這一運動改變了我們原本的生活世界，促使世界各個層面發生了非常基本、全面的變化，特別在人與人的關係方面。家庭關係，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被打破，大批女性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女性的加入，使原先的工作性格被大大改變，許多的基本預設被打破，和諧、責任等重要價值再一次被提升到較高的位置。中國傳統的“陰陽”定義被重新改寫，陽不再是單純男性的代表，陰不再是單純的女性代表，有韓國學者指出，當女性處於工作中的領導地位，她就是陽，當她處於母親的位置，她就是陰。《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謂坤道，也不再是單純地針對女性，同樣也可為男性所用。東亞社會，一般被認為男女不平等的情況比較嚴重，可是目前已有不少改變。

再次，關於語言。美國的哲學家，Rachel · Rocky 曾指出，語言的發展會引起全球化，在50、70年後，也許只剩下一種語言發揮着重大影響力。提出這句話時，他還未到過中國。到過中國後，他改變了看法，認為可能會有兩

種。他有如此之判斷可能是由於他並不瞭解亨廷頓教授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由文明衝突研究美國的認同、美國的文化論，學者們發現比較值得擔憂的是語言問題，英語並非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合法語言，加尼福利亞洲約佔50%的人使用西班牙語，這種語言在布什的家鄉德州、新墨西哥州、福羅里達州同樣影響十分大。未來的美國或許會是雙語國家。德國情況略同，由於土耳其外勞人口的不斷增多，德文和土耳其文在德國變得越來越同樣重要。可是，眾所周知，一旦語言發生衝突，社會團結將難以保證，比利時著名大學——魯汶大學由於弗拉芒語和法文的衝突，而分成兩所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最後，關於更複雜的衝突——宗教。世界除主要的七大宗教外，還有其他一些宗教，眾多宗教間能否和平共存，是人類文明能否持久共存的重要因素。南亞有印度教和回教；中國有道家和儒家；中東有伊斯蘭、猶太教和基督教。眾所周知，在印度，伊斯蘭教和佛教常有衝突；在中東，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衝突得非常厲害。而在東亞地區，所謂的儒教文化圈，由於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情況比較樂觀。一般認為中國有三教——儒、釋、道，這三教間一直保持着和諧，在此我提議應該把三教改為五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同樣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基督教一旁支——景教，於唐代時期在中國就十分活躍，如今還保留着當時的景教流行碑。關於伊斯蘭教，有一傳說指出，穆罕默德第一批弟子曾到過中國，這並不一定是歷史事實，可至少從元代開始，伊斯蘭教就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在韓國，主要是巫教、儒家、大乘佛教、基督教，現代基督教發展迅猛，大約有30%的韓國人是基督徒，幾大宗教間基本維持和諧。日本是神道、大乘佛教以及儒家倫理，一位日本重要的學者指出，日本民眾有接近70%信奉神道，70%—75%信奉大乘佛教，他們同時信奉神道與大乘佛教，並且基本不揚棄儒家倫理。因此，儒家倫理是東亞社會的特色，值得全世界學習。

上述關係的和諧，包括由於年齡、地域、階層不同所構成的可能的和諧，不可能依賴於某種政治約定或者其他精神因素的調節，只能貫徹文明對話的原則。而文明對話的基礎和精神資源，須是處在世紀性發展中的儒家文

化。

中國文化，由於受到儒家思潮的影響，是一種講究對話和不斷學習的文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Amartya Kumar Sen，出過一部書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慣於爭鳴的印度人》)，意思是能說會道、善於論辯的印第安人。與其相反，中國人受儒家文明影響，講究對話，善於學習。孔子曰“君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首篇提到的“學而時習之”，都是在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以及過程性。17世紀有一位思想家提出，假如孔子活到80歲，將達到藝術和道德完全融合的境界，即“隨心所欲，不逾矩”，那後來這幾年他是否可以輕鬆愉快？結果儒家學者不無例外地認為，孔子將會加倍努力，使自己更上一層樓，他是一位不斷學習的典範。在孔子的思想裏，好學有特別的意思，在《論語》中記載，有一朋友問孔子“你的學生當中有無好學者？”他說有，顏回，可是他已去世，現在沒有一個學生好學。因此好學在其思想裏有非常高的要求。

儒家有着源遠流長的歷史，是一種超時代的文化。所謂超時代的文化，就是自先秦到今，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孔子曰“述而不作”，大概在孔子之前，儒家思想已有所發展，孔子一生以繼承發揚周公治理舊約為願，說明在孔子之前，甚至於堯舜禹湯武時代儒家思想就已有所發展，一直到今天。儒學的發展可分為三期，嚴格來說應該是十幾期，從先秦，到秦、兩漢，到魏晉，到唐宋，又到元代，不可忽略金代的儒學，劉英、許恆等著名儒學家，到清代儒學，鴉片戰爭之前、之後的儒學，五四時代的儒學，30年代的儒學，海外的儒學，建國以後的儒學，一直到今天的儒學，情況非常複雜。儒學第一期的發展，是從曲阜的地方文化，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逐漸成為中原文化的主流，然後受佛教的影響，在中國的精神世界佔重要的地位。在唐代，精神方面，佛教、道家佔主流，儒家在此期間不斷發展，到宋代完成復興。儒學第二期的發展，是從中華文化，發展成為東亞文化，形成儒教文化圈，此地域圈包括中國、新加坡、香港、臺灣、澳門、日本、韓國、越南，還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華人世界。儒學第三期的發展，是從鴉片戰爭以後，面對西方的挑戰，曲折發展，一直到今天在不斷討論，能否進一步的

發展，如何進一步的發展。80年代，我提出“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前景？”這一課題，現在重新來審視這一題目，從各方跡象看，儒學應該是一陽來復，剛恢復，幼苗稚嫩，未來能否發展還存在許多未知之數，但希望還是明朗的。

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具備着一定的條件，同時擁有一定的資源以應對各種挑戰。德國文化哲學家雅斯貝斯（Jaspers, K）在1948年提出，塑造人類文明最重要的四位典範的人物，是蘇格拉底、孔子、釋迦牟尼、耶穌。到今天或許還應添上穆罕默德和老子。此種說法的提出，說明他認為儒家傳統有着深厚的歷史背景，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孔子理應成為塑造人類文明的重要典範。

儒家之所以能這樣發展，離不開它的開放性。在很早以前，儒家就開始與各種文明的對話，從最早的與道家、墨家、楊朱、法家、陰陽五行的對話，到後來與佛家的對話，乃至現代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其的衝擊，這些對話，促使儒家的不斷發展。中國知識界對伊斯蘭教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18世紀，如王岱與、劉智，在中國長大的劉智，母語為波斯文，同時掌握古代漢語，對儒家文化及伊斯蘭傳統文化深有研究，完成了《天方性理》，天方指伊斯蘭，性理是宋明儒學的重要課題，即深究性命之學，這部書後由我們團隊歷經六、七年時間完成翻譯、注釋，並由哈佛大學出版，共600多頁。此書出版後在伊斯蘭世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改變了伊斯蘭世界對於中國伊斯蘭文化研究的看法，因為他們從未考慮過遠在17、18世紀中國能以漢語創造出如此傑出的伊斯蘭傳統文化學術研究著作。至於中國基督教的學術研究，時至今日仍未出現世界級的基督教現象，可是目前已經有很多學者在做漢語基督教研究，相信假以時日傑出的中國學者定能有所成就。

中國有非常豐富的傳統文明對話資源。所謂的文明對話，就是由於各種矛盾、衝突，對話成為必要，如亨廷頓教授在《文明衝突》中所提出的文明衝突，因為有文明衝突的危險，所以對話成為必要。美國在9.11恐怖襲擊以後，由布什所代表的美國政府走向單向主義，這對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於美國的靈魂，都構成了非常大的殺傷力。因此，美國在一段時間內，包括它最親近的盟友——英國，都對其抱有意見，法國、德國、義大利無不例外。

外，東亞伊斯蘭世界、印度更不用說了。奧巴馬上臺後，美國政府才開始放棄之前的單向主義，開始進行各種不同類型的對話，與伊斯蘭世界、埃及、非洲進行對話。現代社會，文化、經濟等各種領域都在進行對話，對話成為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是我認為對話應該是全面的，不能僅限於人類文明、宗教等的對話，在不同國際社群、不同地區間都應該進行對話，歐盟和東亞要對話，北美與東亞、歐盟要對話，這是區域間的對話。另外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對話，中國與日本非進行對話不可。地方與地方要進行對話，民族與民族間要進行對話，漢族與少數民族要對話。另外各種問題都應該通過對話來協調解決，如貧富不均問題等。對話十分重要，怎樣進行對話是各方考慮的問題。對話必須具備最基本的心態：容忍，容忍為最低之要求，除此之外，是承認，承認對方的存在、價值，即使他是你的敵人，也要承認他。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着長期的血債，可是他們都必須承認對方的存在，不能把完全消滅對方作為目標。承認而後要尊重，只有互相的尊重才能夠互相學習，只有互相的學習才能夠互相參照，不以對方的差異性為威脅。除此之外，開展對話不能有所預設，期待利用對話來說服對方接受你的觀點。譬如我是基督教徒，我不能夠以宣傳福音的方式來進行對話，強迫其他人接受福音，追隨上帝。2001年在聯合國，由安南所主持的一個旨在推動人類對話的小組，經過長期的協商，決定用儒家的金科玉律作為進行對話的基礎，此金科玉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已所欲施於人”有所不同。可是各種對話必須要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疏導，才有可能形成共識，“已所欲施於人”“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推己及人”才能有所發展，對話並非為了說服對方，宣傳我們的價值觀，說明我們的立場，而是希望人家能夠消除對我們的誤解。

二

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們認為對話的第一精神是聆聽。聆聽的“聽”，就是深度地聽，有耳邊風地聽，中國文化傳統對“聽得”相當重視。現代漢語“聖人”的“聖”，是“又”“土”，古代漢語，“聖”字是“耳”字加“口”字，“耳”字相當重要，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對於“耳順”，馮

友蘭先生覺得不恰當，認為“耳”為衍文，“耳”字可以去掉，剩下“六十而順”，這說法是個極大的錯誤。耳順的“順”是一種母親的道德，因為母親對孩子總是耐心而樂意地傾聽、欣賞，這種難得的道德時至今日仍非常重要。

對話的目的是拓展我們的視野。與一種完全未接觸過的文化傳統進行對話，有助於自我文化的拓展。孔子時期，道家思想對孔子有一種誘惑力，道家如此勸說孔子，您現在的狀況一塌糊塗、無可救藥，為何不與我們一樣回歸田野，進行悠閒的個人修養？孔子曰“鳥獸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離開現在的狀態，尋覓一處安身立命之地的確非常有價值，但是我不能如此做，這就是所謂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孔子的知識理念強迫了他非如此選擇不可。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對話，才使孔子有了新的觀念。孟子時期，楊子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為”，墨子是極端的集體主義者：“兼愛”，愛路人的父母親要如愛自己的父母親一樣，每個人都要以寬大為懷的方式進行博愛。孟子認識到事實並不能如此，如果你對父母的愛如對路人父母親的愛一樣，那你對你父母親的愛就如對路人一樣淡漠。人類的情感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需要慢慢積累、學習，就如水，要水位不斷提高才能流得遠，每一個人在修身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同情心、慈悲心並不一樣。孟子因為楊朱、墨翟的挑戰，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中道思想，這種思想既非極端個人主義，又非極端集體主義。與別家思想的對話、交流，使儒家拓寬了自己的視野，不斷完善儒家思想體系。

面對21世紀，儒家的一大傳統——“心學”將會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這一傳統在中國大陸曾受過極大的批判，在一段時間內，許多學者都認為唯物是健康的，唯心是需要被批判的。在唯心論裏，遭受批判最多的是主觀唯心論，而主觀唯心論的提倡者是孟子，所以才會有了長期對孟子研究的不重視。1994年，在孟子家鄉周縣舉行的孟子學術會議，更在會前說明主要討論孟母，即討論教育，結果的確是論及孟子的學說極少。面對21世紀，研究“心學”，極具意義。早在傅斯年任臺灣大學校長時，就將大學一年級的國學改為修《孟子》，任何臺大的學生不通過《孟子》不得畢業。朱熹時期，《孟子》發展成為四書之一，成為中國儒學的典範，而研究孟子，必須從孔

子、完成《中庸》的子思子開始。“心學”的研究範圍，不能僅限於孟子，還要包括荀子、董仲舒、陸象山、朱熹、王陽明、劉宗周等重要思想家。除此以外，還有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勸、賀麟和馮友蘭等近現代學者。五四運動時期，包括陳獨秀、胡適之、魯迅、巴金等知識界精英在內都對儒學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儒家文化逐漸被邊緣化。可就在那個時代，熊十力等這幾位學者卻在重新發揚儒家的傳統，並且十分注重“心學”，熊十力通過《易經》展現所謂中國哲學的本體論，這其中“心學”十分突出；梁漱溟最後一本書是《人心與人生》，張君勸寫了《宋明儒學》，賀麟從德國的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和叔本華的學說來發展中國的“心學”。馮友蘭先生的情況比較複雜，他曾受四人幫的影響，對儒學進行批判，寫一部《論孔丘》的書，可到了80年代，他思想有了非常重要的轉折，第一，放棄了毛澤東所謂的“鬥爭哲學”，使用了“仇必和而解”的觀念，認為要以“和”來解矛盾衝突；第二，以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安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其終極關懷、最終理想。建國以後，相對於國內無人談儒學的冷清局面，在海外，在香港、臺灣，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香港的新亞書院，臺灣的東海大學，有幾位重要的學者，如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方東美、錢穆等研究儒學，集中討論心學，錢穆，到90多歲高齡仍口述文章，談論“心學”，其認為中國文化對世界做出貢獻最重要也許就是人心和天道的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這篇文章在當時的臺灣《聯合報》刊登後，反響不大，而我看後卻非常感動。後來，他的夫人胡美琦女士在劉夢溪先生主編的雜誌《中國文化》發表了一篇序言，連同這篇文章一同發表，敘述了這篇文章的背景，她說，錢先生這篇文章由其記錄了，她問老先生這篇文章所論的“天人合一”不是老生常談嗎？老先生聽後不悅，說：“以前說過的，現在也可以說，以前不可以說得透徹的，現在也可以說得透徹，這就是我的徹悟。”相對於臺灣反響的冷淡，大陸則是另一番情景，剛去世的季羨林先生看後非常感動，還寫了一篇文章，把這篇文章抄在了自己的文章裏面，希望更多的人看到錢先生的文章。後來在大陸，張世英（研究西方哲學）、蔡尚思（批判中國文化，出版過《中國傳統文化的總批判》一書）、李慎之（研究自由主義）都無不為錢先生的文字所感動。

但是錢先生所談論的天人，人心和天道，與季羨林先生所說的有點不同，季羨林所強調的“天”就是自然。這個觀點，我不太接受，一方面我認為“天”是自然，但是“天”在儒家裏又不僅僅是自然。天道就是天和地，如果“地”是自然，“天”不也就是自然，要建立天、地、人三才，需要的不僅是自然，還有天道，這在《論語》《孟子》裏面談論極多。何謂天道，何謂天？儒家的“天”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相比有一個特色，基督教認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不僅甚麼時候都在，而且甚麼事情都知道，同時他有足夠的能力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儒家的天是全知全覺，但並未全能，他甚麼都知道，甚麼都能感覺到，但是他沒有能力改變一切。基督教有一個複雜的問題，假如上帝愛世人，他又是全能的，那為甚麼世界會出現殘忍的事情，而他又不去干預，譬如納粹事件，成千上萬人餓死的事件等。

世界發展史上，關於人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幾個，一為古希臘“人是理性的動物”，一為馬克思提出的“能夠製造工具有目的地勞動的動物”，一為現代許多哲學家所認同的：人是“使用象徵符號的動物”。這些說法都有一個特點：以一句話定義人的本質特色，背後隱藏着一個重要的理念，我稱之為“規約主義”，就是把一個複雜的現象進行非常細致的定義，一句到位，人就是理性的動物，就是工具的動物，就是語言的動物。儒家不以規約的方法進行定義，在孔子的時代，第一，儒家認為人是感性的動物，《詩經》裏所談的都是情的問題。第二，人是社會的動物，《禮記》裏所談的人與人的關係都是社會問題。第三，人是政治動物，《尚書》所談的是人如何通過一套管理成為聖王。第四，人是歷史的動物，《春秋》記載歷史。第五，人是追求終極意義的動物，這正是《易經》裏所談的。除此之外，人還有多種可能性。儒家以舉例的方式，將人的各種面孔體現出來。人是有記憶的，沒有記憶就沒有自由，如果你把你所有的記憶都放棄了，你就沒有自由。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從五四運動以來，中華民族碰到一個極大的困境。在古代，各朝代都在修前朝的歷史，可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出現了極其嚴重的文化斷裂，從鴉片戰爭至民國，一百多年間，每十年出現一個斷裂；從建國至改革開放，每五年都會很大的變化，可正因為出現極大的變化，歷史被切斷了。我無法理解這種被切斷的歷史，無法接受健忘，過去不堪回首，未

來一片美好，更不能接受的是主動地遺忘，強制性地切斷記憶，忘記文革，忘記各種事件。歷史被切斷了，歷史是嶄新的，歷史是扭曲的，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寫出了不同的歷史。與此同時，“追求意義”被現代社會所冷待，大半的人追逐成功，特別是在企業當中，利用雄厚的資金打垮其他對手，然而，又有多少成功的人同時又是幸福的人，可是追求意義的人，即使不成功，他也會有安生立命的地方，可以作出許多造福人群的事情，成功的人，他成功以後，再要追求意義，也同樣有價值。

這樣說來，人到底是甚麼？天，全知全覺但不全在，人是觀察者，《易經》夬掛講得非常清楚，向上向下，下看地理，上看天文，欣賞、認識山川河流，人同時參與天地之大化，宇宙的發展，這些都是儒家的基本精神。《中庸》講“唯天下之至誠”，“至誠”的人，盡己之信，以盡人之信，充份體現了人的基本特質，體現了人性，同時體現了悟性。只有體現悟性，人才能參宇宙之化育，以天地為善。《荀子》講“天生人成”，人具有創造的力量，可以完成人文世界、人文景觀，在很多地方可以替天行道，這都是人文意義下的世界觀。人有足夠大的能力、能量、智慧、影響力來參天地之化育，同時也有足夠的能力成為破壞者，以極強的殺傷力摧毀社會、自然。可是俗話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自然災害，人是可以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禹治水，依靠人的智慧、科學能力、領袖魅力、人的犧牲精神調動無數人的力量把水災轉化成灌溉良田的機子，可是“人作孽”則不可逃。現代自然科學，資訊傳播科學影響極大，人類越來越成為生命的共同體，但人類卻面臨着許多無法協調的困境，人類創造了大量的殺傷性武器，製造出來的核彈已經足夠摧毀整個地球幾百次，這是“人作孽”的重要標誌。由於各種疾病，包括艾滋病、瘧疾，人類受到了很大的干擾。同時，人類具有極嚴重的暴力傾向，黑社會、恐怖主義逐步全球化。由此可見，人已處於極大的危機當中。

“危機中如何自處”已成為大家關注的課題，孔子說“人可以弘道，非道弘人”此話並非強調人塑造自然的能力，而是強調人的責任，人可以弘道，而非道弘人。這一觀念，可能與大家常引用的價值觀念有所不同，如愚公移山，愚公所面對的山，可能就是孟子口中的“牛山之木嘗美矣”如此美

的山，為何非要移動它不可？愚公強調我不能夠移走它，我成千成萬的子孫一定能夠移走它，總之就必須摧毀眼前這座山，這代表着甚麼？代表着“人定勝天”，可這對生態環保是一種極大的罪過。人類應該“敬天、畏天、事天”，與自然保持着一種持久的和諧，這些觀念的出現、被強調，使儒家長期積累下來的資源被賦予了新的價值。

關於這個價值，我先提一些題外話。儒家開始時的核心價值足與西方開始時的核心價值進行平等的對話，在五四時代，因為強烈的愛國主義和反傳統主義，要求向西方學習，就把儒家中糟粕的糟粕與西方的最高價值進行不平等的對比，中國代表着鴉片煙、等級制度、男權、婦女的纏足，西方代表着自由人權、平等價值，中國一無是處，這造成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代，比如中醫，魯迅曾因西醫、中醫都無法治癒他的父親而倍感後悔，甚至懷疑自己為何墮落至相信使用中醫，到現在仍有不少人認為中醫是偽科學。五四運動將儒家最陰暗的一面用放大鏡進行了放大，這對儒家進行自我反思、自我認識、自我發展都做出了很好的貢獻，但是他們太過樂觀了，以為將儒家鏟平，就能以西方價值觀來拯救中國。的確自啟蒙以來，西方形成了許多普世價值，如自由、理性、法治、權利、人權、市場經濟、民主社會等。可是，在亞洲，我們也有許多普世的價值觀，如團隊精神、正義、同情、禮讓、責任、慈悲、“和”的觀念。這兩種普世價值觀紮根於不同的地域，必須進行平等的對話，互相學習，而非用西方的價值來宰製或扭曲亞洲的價值，也不是用亞洲的價值來挑戰、扭曲西方的價值，比如人權，我們的政府以“團結”的名義，犧牲少數人的權益，來贏取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並不符合儒家的精神，孟子說“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現在我們談對話，講發展，約瑟夫·奈在《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中提出“軟實力”，這不過是另一種美國的宰製，不靠軍事、政治、經濟，而靠文化，美國的軍事、政治、經濟遠比我們強，可一提出“中國威脅論”，不僅美國，西歐也一下子就過來圍剿中國。我們並沒有軟實力，我們應該以我們的核心價值和西方最高的核心理念進行對話，只有進行對話才會有獲得平等的可能。軟實力，能否換過另一個詞，因為用實力，用 power，本身就有問題，現在中國經濟位列全球第三，甚至預算20年後將會是全球第二，再過就超越美國成為老大，

但是這個所謂全國的經濟力量，如果變成計算人均，我們就會在100多個國家中排到100甚至更低，甚麼時候我們能提升到第50、30，那時間將非常漫長。所以我們必須瞭解現實，這並非鄧小平所說的韜晦，而是應該對話，獲得認同，進行多元的反思，使各種價值發揮出真正的力量。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通過對話，認識西方的價值，將自由與責任、法與理、權力與責任等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出真正的威力。通過對話，瞭解自然，而非強調戰勝自然，宰製自然。很多神學家說，不要把自然當作完全外在的存在體，而是應該把自然當作你存在的必要資源，必須去愛護、保存它。非洲有一諺語，自然不是祖宗傳給我們的財富，而是子孫後代依託給我們的資源，我們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後看。通過對話，才能使個人的尊嚴與社會的和諧配合起來。真正的和諧，講究“異”。在孔子之前，晏嬰和齊侯談論“和”，齊侯問：“唯據（據即梁丘據，是齊侯的大臣）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和”來自音樂，音樂的“和”來自各種不同樂器各種聲音的混合，因為有“異”才會有“和”。“和而不同”，“和”常與“同”存在矛盾，“和”的對立面是“同”，“和”的必要條件是“異”。

任何21世紀的人文思潮，人類必然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宗教的挑戰，一是自然的挑戰。西方啟蒙所帶來的人文主義，是凡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它是今天為止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是由此發展而來，現代民主、市場經濟、市民社會、現代大學、官僚組織、跨國公司等也皆由此發展而來，它為我們創造了許多的財富、極大的可能性，我們都是啟蒙凡俗人文主義的受惠者。但是這套思想面對21世紀已無法行得通，它受到西方的女性主義、環保主義、後現代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宗教多樣主義的強烈批評。這些批評為儒家創造了非常好的發展條件，就看我們是否能準確把握了。

儒家所代表的人文主義，並不是凡俗的人文主義。一位日本學者認為儒家所代表的人文主義是一種精神性的人文主義。面對21世紀，儒家對幾個大問題有回應的條件，第一，何謂人？我們重新考慮人的定義，到底人是單一，還是綜合的，到底人是利用工具的，理性的，還是多種多樣的。第二，怎樣去瞭解，瞭解是不是就是控制？瞭解是不是轉化，瞭解是不是欣賞？在此，我提出一個概念“體知”，就是體驗，要發展科學、技術，但是要考慮這個對於社會持久和諧的價值。第三，如何行？我們如何行動，這個倫理是不是就通過實證主義的工具理論或者實證主義的實用理論可以解決。實用理論能解決的只是一個經濟人的觀念，而非一個完整人的觀念。第四，我們有何希望？我們可以把人現在碰到的問題分成四個不可分割，但又互相獨立的、互相影響的側面，其中一個就是個人，個人要討論就是身心整合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儒家只有一部份的資源，佛教、基督教所有的精神傳統都在嘗試處理此問題，可是有些傳統過於突出靈魂，而不注重肉體，甚至把肉體當作是靈魂的枷鎖，走向禁欲主義。儒家思想注重身心神靈的整合，認為身體就如地球，雖然凡俗，但並非我們所單獨擁有，人要考慮身心的形成過程，將身心當作一種成就。第二，就是社群，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人注重“天下”的概念，這與世界許多國家不同，美國最高的價值是國家利益，其實更準確說應該是注重地方利益，而完全沒有“天下”的概念。可在中國有“天下”的觀念，連普通老百姓皆有之，這種觀念不僅超越家庭、社會、國家，乃至超越世界、人類，天地萬物皆為一體。雖然目前來說，自私自利的人很多，損人損己的人有，損人利己的有，不損人不損己的有，損己利人的不多，利己利人的更少，但是它可以轉，就算是“損己損人”的人也是可以轉成為利己利人的有價值的人，這些就是儒家非常深刻地傳統。接下來就是自然，人如何與自然保持一種持久的和諧。最後就是天道，中國文化傳統強調“敬天、事天、畏天”，天人相應，我們可以替天行道，但假如我們破壞了天，反過來也只是殘害自己。

（杜維明 美國波士頓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 / 北京 北京大學高等研究院）